

「符合當代」的校史與大學史 為什麼我們需要



資料整理與撰文：成大歷史系/游婕妤
論文發表人：成大歷史系/陳恒安

校史或大學史一直以來都不是廣義歷史領域研究中的熱門主題，且多著重於作品的直接功能性與目標性，因此過往的校史書寫主題，大多圍繞在學校的組織結構、典章制度、大學師生與畢業校友，以及機構或人物相關的知識史與生活史。然而，許多在傳統校史範疇之外的「小人物」、校園環境中習以為常的空間配置與草木魚蟲，以及難以啟齒、正視的「陰暗過去」，卻是現今校史應當拓展的學術視野與專業倫理的實踐，也是一個可以思考、因應當代面臨的問題與需求的重要途徑。

今日，何謂校史？校史書寫的視野與意義

校史的書寫是一種將知識與行動結合的實踐方式，而校史是什麼？要選擇述說哪些主題？以及為什麼我們需要書寫校史？透過梳理這些問題，便可更進一步描繪出21世紀的現在，臺灣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大學？以及，今日，大學能知道什麼？大學應該做什麼？大學可以期望什麼？以此來回應當代更多面向的社會問題。

書寫校史，其中一個明顯的作用，便是可以透過人們對於學校回憶的累積，凝聚校內人士的向心力、認同與歸屬感。然而，當這個校園裡的人們在定義自己的校園生活圈、凝聚「認同」之時，卻也會因此產生「排他性」，而有內外之別，並衍生出「誰」可以掌握述說校史的話語權的討論。對於他校人士、社區居民等群體來說，一個學校的歷史書寫與研究又能帶來什麼樣的意義，則需要先了解學校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隨著時代的演變，學校系統建立的模式以及其在社會上的功能也會有所轉變。學校也是社會變遷過程中的重要場域之一，因此學校與社會之間有著共

同演化的互動關係，而「校史」所要互動的人群，也就顯然不僅限於學校裡的行政人員、老師、同學或畢業校友，而是也進入了公共的場域，和在社會的演進中共同發展的不同群體建立關係，如社區居民、市民等等，進行互動與溝通，以共同面對當代社會中所衍生出的各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在全球化的發展下，「學校」除了具有培育人才的功能之外，亦有需要重視的社會責任，而若要能夠讓學校成為社會信任的機構，「歷史」便是一項重要的材料與基礎。學校若能面對過往的歷史，正視過往的所作所為，即是在向社會宣示這所學校具有反省並願意再次改正過錯的能力與特質，是與時漸進、樂於轉變，同時考慮可以讓社會大眾信任的機構，以及和社會中各個群體互動的機構。而在全球化、國際化的快速發展與變遷之下，個人與一個固定的群體或是固定的環境之間，也不如過往可以透過長時間地培養來建立情感連結，因此，校史的建立便是一項可以讓人們在快速地移動與變遷中，更快與校園有更深的互動、產生連結，以及尋找自我定位與認同的方式。

學校與企業的歷史責任

一般而言，校史作為「宣傳」學校特色與精神的使命從未被忽略，就如同企業為了永續經營發展，同樣需要透過建立品牌來宣傳其所擁有的特殊性。對企業而言，書寫歷史便能夠成為企業對內或對外溝通的重要方式，對內可以凝聚向心，對外則可以透過從以往歷史發展的軌跡中尋找並提煉出與眾不同的價值面向，以營造並宣傳永續品牌的特色，成為民眾得以快速掌握該企業與產品是否值得信賴的依據。讓過去不致成為單純的過去，而能夠成為企

業的人力資源或者行銷部門的重要資源，而得以使其永續發展。對學校而言，歷史書寫也有相同的意義與效果，對內可以凝聚校園向心力與情感認同，若學校勇於面對過往的「陰暗歷史」，對外則可以展現出批判反省的責任感以及積極溝通、轉變的態度，以爭取社會大眾的信任。

當然，負面的歷史議題若處理不善，便可能引發巨大的「公關危機」。舉例來說，1986年的德國Benz汽車公司，在100周年時所出版的企業史書籍《戴姆勒賓士1933-1945：紀錄》，雖展現出主動面對二戰時期的勇氣，然而，Benz對於其在該時期中，強迫外籍勞工勞動的相關爭議與企業的作為卻只是寥寥幾句就匆匆帶過，此舉也因而成為人們抨擊之關鍵。原本Benz率先引領的歷史政治舉措，反而造成了一場公關災難，並多年來影響著公司的形象。這樣的現象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人們所處的80年代，德國公眾對於歷史觀點的關注與興趣，然而Benz面對該議題時的作法卻不符合大眾的期待。不過，企業如何面對陰暗過去，依然有較為成功的例子與作法。例如成立於納粹時代的福斯汽車公司，在1998年國際訴訟開始後，進一步承認過往實施強制勞動的歷史，也願意為此負起法律與倫理責任，後來甚至將「企業面對陰暗過去」的作為視為該企業的「文化」內涵，以表示其並非只為了短暫的宣傳效果或虛與委蛇，而為長期的社會與歷史責任。雖然，勇於從歷史錯誤中學習的企業願意善盡歷史責任，但也並不代表該企業從此之後就不會再做出引發社會爭議的行為。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發現，企業面對自身錯綜複雜的歷史，依照不同的操作方式，對外可能成為公關災難，但卻也可能成為展現企業歷史責任的契機。

由此可知，雖然面對陰暗過去固然有其風險，但歷史債務並不會因不理睬而不存在。所以，積極主動的面對，才是最好的策略，若是拖延、沉默便容易遭受指責，同時，隱瞞越久，後座力也會越大，不僅無法展現出負責的態度，形象的受損也會越來越嚴重，因此便更無法有效建立起與社會大眾溝通、和解的橋樑，也就更不可能在這樣的社會關係中取得大眾的信任。

從培養歷史的債感開始

因此，大學史的書寫，重點不應在於描述現今的組織結構，或堆砌知識的成果，而是應該展開新的書寫範疇，並透過回溯歷史的軌跡與思考、書寫的歷程，以便更清楚理解當代社會之所以如此建構、運作的各種條件，以及回應當代社會的需求並尋找當代的問題意識。





於是，「符合當代的校史」，不應只是緬懷過去的豐功偉業和偉大人物，凝聚校內人士的情感與認同，也須關注那些不光彩的陰暗過去，和過往常常忽略、不被重視的微小聲音，以及周遭的居民與社會大眾。亦即除了必須符合當代大學的需求、符合所有「大學人」的需求，也需符合當代社會的需求，並且同時要能夠通過當代歷史書寫理論與實踐經驗的檢驗。

然而，如何能夠讓校史的書寫引起各方更多的關注與討論？或許可以從培養歷史的「債感」開始。透過回溯過去的歷史經驗與發展軌跡，便可能讓人們有所認知並思索、感受那些不光彩的「陰暗過去」，進而萌生出責任感或虧欠感，並透過批判與反省，促使人們想透過某些行動來回應這種情感所產生的張力。而有了債感與責任感，也就或許能夠用更謹慎的態度與警醒的距離，來平衡史料與感情之間的拉扯，使歷史書寫不至於陷入資料堆砌或情感動員的困境，而能夠有機會對過往歷史進一步釐清、探究和賦予意義，並透過歷史意識的積極實踐以展望未來。